

第五章 驻军四川

方靖奉调七十九军之前，还有过一场烦恼，说来话长：

国民党军内
部勾心斗角

一九四二年，五十四军军长黄维被免职，引起一场大风波。从这场风波中，也可见军队中派系斗争之激烈。

一九三九年冬，日寇攻占越南后，在滇越边境集结兵力，扬言要进攻云南。五十四军奉命由广西兼程进至河口以东滇越边境，准备抗击日寇。不料该军军长陈烈暴卒，即调黄维继任。随后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徵率五十二军来，五十四军归关麟徵指挥。

五十四军是陈诚军事集团中基本部队之一。陈诚当十一师副师长时，关麟徵在十一师当团长，后被陈诚挤走，因而关麟徵耿耿于怀，这时便蓄意搞垮五十四军。他先是在五十四军的师、团长之间挑拨离间，企图使全军分化瓦解。黄维是个十分憨直的人，对关的阴谋进行了公开的抵制，使其不能得逞。后来关麟徵又在参谋总长何应钦面前进谗言，何应钦便签呈蒋介石：黄维破坏军需独立，公积金不报不缴，请予撤职查办。蒋

介石批示：可调本部高参。这也是给何应钦碰个软钉子。

在国民党将领中，相对来讲，黄维属于廉洁的一类。十八军有个良好作风：军、师长调离时，一般都要将公积金移交给下任。黄维离开十八军到了五十四军，这个作风还是保持了的，所以关麟徵与何应钦纯属诬告。

事情的真象是：黄维任五十四军军长后，发现部队给养困难。士兵主食虽然规定每天大米二十四两（旧秤一斤合十六两），但是由于兵站供应的军粮发霉掺沙，份量很不够，加之物价高涨，士兵们每月六元钱的菜金，根本买不到什么蔬菜食油，因此吃不饱而导致军心涣散。黄维为确保部队战斗力，私自决定每人每天增发口粮二两，曾几次向军政部长请求解决，并将质量低劣的军粮用小口袋包装呈送军政部。关麟徵利用这件事向何应钦说：“黄维故意与军政部为难，实际是项庄舞剑！”何应钦想杀鸡吓猴，以处置黄维来压服各部队闹事，便命军需署派员去五十四军检查账目。黄维没有按常规向检查大员行贿，反而板起面孔对来说：“如果你们查出我有贪污中饱私囊之处，请指出，据实报告军政部，将我法办！”言外之意：“不要在背后搞小动作。”如此这般，“钦差大臣”回去，能说黄维的好话吗？加之黄维懊恨之余，又发给何应钦一份语多激愤的辞职电报。这样，黄维就被免了职。

黄维被免职后，关麟徵拟派他的参谋长张跃明接任，并以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师长姚国俊与五十九军五十师师长郑庭峰对调。这是一种并吞他人部队的手法。陈诚是此中老手，岂容关麟徵班门弄斧，就拟派十八军副军长罗广文接黄维的任。何应

钦以罗广文非黄埔将领为理由加以阻止，陈诚便改派十八军军长方天，以罗广文升任十八军军长。方天有黄埔、陆大毕业的双重资历，何应钦再也无法阻拦了，只恨恨地说：“哼，靠土木系就能救中国吗？”

关麟徵枉费心机，到头来落得一场空。五十四军的师、团长们为黄维鸣不平，联名控告关麟徵企图吞五十四军，这使关处境十分尴尬。他却不肯罢休，跑去找陈诚，说：“辞公钧座是即将掌握全国军事的领袖人物了，不应该再封闭在土木系小圈子里。一个军长的职务都不肯放手，这不是干大事业应有的心胸啊！”陈诚本因何、关居心叵测而气恼，又听说何应钦散布谰言，再加上关麟徵一番讥讽，气得胃病复发，吐起血来，只好回重庆治疗。正好碰上蒋介石赴开罗参加国际会议，何应钦便乘机免去陈诚远征军司令长官的职务，以卫立煌继任。

真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自从罗广文任十八军军长后，副军长胡璉又煽动下面的师、团长们跟罗广文捣乱。

一九四〇年方靖升任十八军副军长，保荐胡璉接任十一师师长。这时罗广文任十八军十八师师长。胡璉为拉拢罗广文，竟将十一师库存的许多物资送给了十八师，罗广文自然十分感激。但是，罗哪里知道胡璉如此慷慨是另有所图。胡璉自以为是十一师的“元老”，将来最有资格取代方天当十八军军长，便事先作好人事准备。却不料方天调五十四军后，陈诚派罗广文接任。胡璉希望落了空，变友为敌，就象对叶佩高一样，在下面跟罗广文捣起乱来。石牌战役后，胡璉得到蒋介石和陈诚的特别嘉奖，提升为十八军副军长，后又调蒋介石的侍从室。胡璉

到了侍从室，便趁机讲罗广文的坏话，说罗如何贪污走私、败坏军纪。陈诚得知后，十分生气，扬言：“你们都不要争，我把方靖调回来就好了。”胡璉闻讯大吃一惊，急忙央人在陈诚面前为他说话。陈诚的部下都知道陈诚最恨人进谗言，所以不敢直说方靖如何如何，却说：“六十六军刚刚整顿好，就将方靖调走，恐怕不利。胡璉是十八军的老人，人事关系熟，不如让他升正更恰当。”陈诚认为言之有理，便让胡璉升任十八军军长，调罗广文任八十七军军长。

罗广文去八十七军上任，途经六十六军驻地刘家场，便去拜访方靖，诉说心中的委屈。

在国民党军队中是十分注重历史关系的，只要过去曾是上级，后来彼此地位如何变化，老部下仍要尊重老上级。罗广文曾是方靖任二九四旅旅长时手下的团长，所以罗对方始终毕恭毕敬，就是尔后罗升任了第四兵团司令，方靖还在七十九军任军长，电信联系时，罗仍旧称方为“海公钧座”，署名时加一个“职”字。

罗广文对方靖流着泪说：“钧座是部下的老上级，部下的为人，钧座是了解的。胡璉为谋十八军军长职务，在重庆造部下的谣言，坏部下的名声，实在太卑鄙了！”方靖安慰他说：“事已至此，忿恨何益！依我看，只要自己有才能，肯努力，到哪里也能干出成绩来。我们都是辞公的部下，为辞公的事业，个人恩怨就不必计较了。”其实，他方靖自己此时得知失去了回十八军的机会，也在郁郁不乐哩。

正在这时，七十九军军长王甲本与所属九十八师师长向敏

思不和，陈诚想调方靖去七十九军，命郭忏征求方靖的意见，方靖当时就顶回：“不是有人说我刚把六十六军整顿好，不能离开吗？我还是留在六十六军好。”

事过不久，郭忏再次对方靖说：“王甲本与向敏思矛盾激化，如果不解决，七十九军就会被闹垮。辞公认为你在七十九军久有资历，现在该军所属九十八师师长向敏思、一九四师师长龚传文，都是你在九十八师时的部下。所以辞公认为，七十九军非你去不可。”

到这时，方靖纵有一千个不愿意，一万个委屈，也不能过份拂老长官陈诚之意，只得将由他组建起来的六十六军交给副军长宋瑞珂，赶赴贵州接任。

王甲本因为夏楚中不推荐他接任九十八师师长，始终耿耿于怀，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因官职的升迁而消除，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深。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由于王甲本作战很勇敢，为人颇为正直，而夏楚中待部下也比较宽厚，所以两人相处的时间很长，却未公开决裂。后来夏楚中升任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仍旧保荐王甲本升任七十九军军长。倒是王甲本为人固执，不肯消除前嫌，始终与夏楚中结怨，因此引起夏楚中的心腹将领九十八师师长向敏思的反抗。

王甲本升任七十九军军长以后，向敏思不服，扬言：“王甲本既非黄埔毕业，又非陈辞公旧部，有什么资格当七十九军军长！”又说：“王甲本不服从夏楚中，我就不服从王甲本！”

原来王甲本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出自云南部队范石生旧部，虽然进过陆军大学深造，仍旧不能列为嫡系将领，这是国民党

复

军队中一条严格的界线。

王甲本治军极严，有“王屠夫”之称，处决部下真有杀人不眨眼的凶狠。仅举一例：七十九军由湖南向贵州撤退中途，有两名尉级军官带领十二名士兵骚扰百姓，被王甲本撞见，当即喝令卫士排逮捕，并扬言要在部队宿营时，将这十四名官兵处决！当时军部官佐都认为既未造成百姓多大损失，一次要处决这么多人，未免太过，所以都要求参谋长和副军长去讲情，求得宽免。

副军长甘登俊是保定军校第八期毕业的老资格，只因为人过于忠厚，胆子又小，一直升不上去，但在军队中是讲资历的，所以仍受到尊敬。他向王甲本苦苦哀求了一整天（行军途中），最后王甲本方算松了口：“杀是一定要杀的。看你的面子，杀官不杀兵，杀兵不杀官，由你决定！”甘登俊与参谋人员商议，一致认为官与兵的价值虽然不同，但两条人命与十二条人命对比，还是保兵不保官的为好。于是部队宿营时，王甲本下令将两名尉官在队前处决。

王甲本有一条爱犬，名唤“阿宝”。每一外出，阿宝总是跑在马前。所以凡是正在干不法之事的官兵，一见阿宝，便惊慌逃窜：“王屠夫来了！”如此动辄杀戮，自然不免招怨。

王甲本与向敏思的矛盾公开化，是在一次对九十八师和一九四师视察评比时挑起的。评比会上，一九四师占先，九十八师受到王甲本的指责。向敏思本来是个争强好胜的人，脾气极暴躁，不能忍受指责，于是发生争吵。从此，向敏思不接王甲本的电话，部队行军作战，师长向敏思公然脱离部队，单独行

动。

按情理讲，军长与师长不和，应该责备或处分师长。因为向敏思是黄埔四期毕业的嫡系将领，又是陈诚系统的人，所以受到袒护。经集团军司令部呈报上去，军政部决定调王甲本为高参。

当时七十九军属二十四集团军王敬久指挥，调令未及时下达。王敬久说：“七十九军还在行军作战，发下调令，王甲本抬脚一走，部队交谁指挥呢？还是等方靖到后再公布吧。”

正因为部队在行军作战，王甲本对向敏思的抗拒也未及时处理，还想等到部队驻定后，再请求军政部将向敏思免职调开。

王甲本
牺牲

一九四四年十月上旬某日，即在衡阳失守后，七十九军军司令部行抵湖南东安一带，在山口村稍事休息。王甲本估计情况是安全的，命令部队继续转移。

军部机关行动比不得战斗部队那么迅速，王甲本性急，便带了九个卫士和随从吴副官先行。

王甲本与方靖的身形恰恰相反，肥胖高大，挺胸凸腹，体重在二百斤以上。如此体重，自然行走困难。但是身为军人，随时都要行军作战，不能不行走，所以他虽然有一匹高壮的马，却经常不骑，借以锻炼步行的能力。

这次他先行，也是徒步。两名卫士带着他的爱犬阿宝为前导，四名卫士随在后面，吴副官走在左侧，顺着山路走出山口村。

突然，阿宝狂吠不止，两名前导卫士观察前方后，回身对

王甲本说：“报告钧座，前面发现敌人！”王甲本不慌不忙地举起望远镜看了看，便十分自信地说：“这是广东部队。我们继续前进！”原来广东部队多有戴钢盔的，所以他把日寇误认为是友军了。

当时王甲本一行人正在下一个山坡。日寇听见犬吠，早已作好准备，等到王甲本一行走近，日寇开枪射击，两名前导卫士中弹倒地。

吴副官大喊：“赶快抵抗！”拉着王甲本往回跑，四名士兵拔枪抵抗。但是，他们四支手枪如何抵挡得住日寇的机枪呢！很快便有三名卫士被击毙，一名转身逃走。

王甲本的肥胖身体成了负担，登坡不几步便气喘吁吁。吴副官见情况危急，便背起军长爬坡。尽管吴副官身高力大，负重二百斤登坡也是困难的，况且后面日寇赶得急，他只得放下军长，拉着他横向跑。

日寇似乎已看出王甲本是个大官，所以只开枪击毙了吴副官，端着刺刀冲过去要活捉王甲本。王甲本已跑到梯田的中间，再要登高已不可能，于是拔出手枪大叫：“我是军人，决不做俘虏！”他的一支手枪击毙两名鬼子兵。日寇被激怒，端着刺刀“呀呀”扑来。王甲本手枪中子弹射尽，便弃枪空手夺刀，攥着日寇一把刺刀死死不放，以至双掌都被刀刃割伤。日寇趁此机会扑近，左右两把刺刀戳在王甲本双颈上，背后又有个鬼子朝他开了一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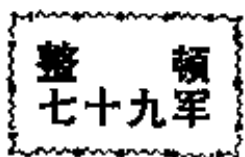
这时军部及直属部队已从另一条岔路通过了，并未发现王军长与日寇的遭遇战。唯有因收电话线而落后的通讯参谋李印

玺在山坡上目睹这一壮烈场面，但是他没有携带武器，无法营救。随后，又见日寇的大部队开到，沿着山坡通过。

原来杀害王军长的一小撮日寇是大部队的斥侯，或谓之尖兵。

鬼子去后，李印玺才下山去找王甲本的遗体。

抬放王军长遗体时很费了点事，因为这位抗日英雄虽死，犹叉腿攥拳，怒目圆睁。



王敬久对七十九军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方靖在十月二十日到达七十九军驻地桂林时，军司令部几乎不见人影，到处都能看到结伙聚赌的官兵。四周的老百姓被他们骚扰得不能安居，纷纷向外地逃避。

看到这些现象，方靖竖起了两道剑眉，心中顿起杀机。

直到军长亲自指挥卫士布置好了卧室，上校副官处长张汉才慌慌张张奔回军司令部，来见这位新到任的军长。

不错，方靖自一九三四年底到一九三七年八月，在九十八师二九四旅当了将近四年的旅长。七十九军是以九十八师为基干发展而成，应该说，他对七十九军的人事情况是熟悉的，而七十九军的将士也应该对他有所了解。但是在他离开九十八师将近七年的时间里，人事变化很大，除了少数师、团长以外，彼此能够了解的已为数不多了。张汉便是不甚了解的一个。他面对其貌不扬的新军长，不免暗暗冷笑：“哼！你，就是你这样一个麻子大、个子小的老头子，也敢来当七十九军的军长！”他皮笑肉不笑地说：“钧座远涉江湖，为党国辛苦了。因为未得到

钩座到达的确切时间，所以没有准备隆重欢迎。不知钩座在生活起居上还有什么需要？”

方靖在部队里混了二十多年，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他不动声色地说：“抗战期间物力艰难，一切均须从简。我别无需求，只请你马上向部队下达一个通知：各师校级以上军官跑步来见！”说罢一挥手。

“跑步来见”是军队中流行的一句官腔，那是快的意思，也包含着严厉的成份。

张汉微微一怔，他似乎预感到方靖要采取某种措施，但又不相信面前这个人能采取什么措施。

七十九军校级以上军官在军部门外的打谷场上列成“□”型纵队。在队伍的中间空地设一方桌，方靖站在方桌上准备向军官们首次训话。张汉喊口令整好队，跑到方靖面前行举手礼：“报告钩座，整队完毕，请钩座训话。”

方靖环视了一下军官队伍，以他那窄嗓音却底气甚足的语调训道：

“大家注意！”这是将领训话开场白的习惯用语。受训者听到这句话时必须立正，于是队伍中发出整齐的一声“喇”响。“稍息！我们是嫡系部队，在陈长官关怀和领导之下，所以必须有铁的纪律。现在我强调四大纪律：

“一，奉命迟疑者，杀！

“二，临阵退缩者，杀！

“三，官兵同赌者，杀！

“四，奸淫妇女者，杀！

“军令如山，军法无情。希望大家自爱，切勿以身试法。

“全体——脱帽！为悼念抗日民族英雄王甲本军长，默哀三分钟！”

方靖的训话出人意料地这样结束了：

“我是当兵出身的军人，讲话干脆，办事也干脆。

“我的话完了！”这也是将领训话结束时的习惯用语。

张汉喊口令：“立——正！”朝方靖行举手礼，一直目送方靖走远，“稍息——解散！”

军官们“嗡”地一下散开了，但是并没有立即散去，而是在打谷场上议论纷纷。许多人第一句评语是：“嗨，原来是这么个干瘪的小老头！”在杂乱的议论声中，有一个人提高了嗓门，怪声怪气地学着方靖的口吻：“大家注意！稍息！我是当兵出身的军人，说话干脆，办事也干脆。我的话完——了——”于是引起一阵哄然大笑。

军参谋长和副官处长原也在一旁议论，听见刚才那出洋相的学舌，两人挤眉弄眼会心一笑，然后不约而同的叫骂一句：“真他妈的莫明其妙！”

但是，在方靖的办公室里，九十八师师长向敏思，一九四师师长龚传文，都毕恭毕敬地站在方靖面前，丝毫不敢懈怠。

方靖有信心带好七十九军，也正因为有这两个师长。他们在老长官面前一致表示：服从指挥，全力配合，尽快把部队整顿。方靖得到了安慰，他挥手让两个师长坐下，两个师长却仍旧站得笔挺看着他，直等方靖首先入座，他们才对面坐下。——这也是军队的规矩，长官不坐，部下不能先坐；长官起身，部

下赶紧起立行注目礼。

“你们跟我多年，是了解我的。我方某人并非嗜杀成性的刽子手，但是，现在部队纪律坏到极点，不杀不足以立威，不杀不能严肃军纪。昔日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我现在也只好狠狠心杀一儆百了！我要求你们不要手软！”

“是！”

方靖这一告戒，几乎惹起一场风波：一九四师有个上尉连长杀了老百姓家一口猪，不但不给钱，还打了家主一记耳光。岂知这个老百姓竟是李宗仁的哥哥，他扬言要告到李宗仁、蒋介石面前。一九四师军法处上报师长龚传文，龚传文一则因这人的后台太硬，不重惩部下恐惹起祸端；二则又有军长的告戒，便批了“处决”二字！为杀一猪而杀一人，也未免太过。方靖事后得知，虽不以为然，却也不便埋怨部下。不料事过五年之后，死鬼连长的亲爹，竟以“总统战地视察官”的身份，被派到七十九军来了！参谋处的人向方靖报告，并说有可能他是为报子仇特意向蒋介石讨得这件差事的。方靖听了也不免微微一怔。但是他并不着慌，一则他依仗有陈诚作后台，二则他也知道这“战地视察官”头衔的来历。一九四七年秋，他在南京中央训练团受训时，适遇一批赋闲的将领跑到钟山哭中山陵，说他们追随国父革命，转战多年，现在竟被弃置不用！当时南京舆论哗然。蒋介石怕引起非议，不得已给他们授予“总统战地视察官”的头衔加以安抚。方靖知其底细，所以装做不知，以静待动。他的部下们为他都捏了一把冷汗。所幸当时国民党队军节节败退，形势十分紧张，已不容许这个“视察官”搞什么花样

了。一九四八年春节之前，他借口回湖南老家过年，狠狠敲了方靖一笔竹杠，离开了七十九军，这是后话。

方靖首先从军司令部及直属部队整顿起，他检查司令部各处的工作，认真，仔细。他在军队里任过各种职务，深知各部门的弊病，所以每到一处，都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来，使那些藐视他的部下，不得不肃然起敬。

紧接着他亲率卫士排到各地检查军纪，发现触犯四大纪律的将士，均就地正法。跟他多年的副官卫士都熟悉他的习惯用语，只见他把手一挥：“拉去睡觉吧！”就是最后的判决。相反，他如用明显字眼，如“给我杀”，或者“拉去枪毙”，倒是可以宽免的，副官卫士们也虚张声势，拉拉推推，一经本人哀求或旁边有人“保”一下，他就赦免了。现在他使用“拉去睡觉吧”的话愈来愈多，连行刑的卫士们也不寒而慄！

有一次，方靖半夜起床去查岗查铺，发现有两个处的军官宿舍空了几张铺，便派一个卫士去找处长问明空铺上的人的姓名、去向。查完铺又去查岗，发现抱枪打盹的哨兵，便悄悄过去，把枪栓下走。他回转寝室时，入厕路过军官澡堂，忽听里面呼么喝六，热闹非常，便抢先闯入，一声大喝：“都拉去睡觉！”正在聚赌的人被这一喝吓得魂不附体，澡堂只有一张门，已被方靖堵住，又不敢夺路，赌徒们便仓皇朝反方向逃窜。情急之下，竟推倒了一堵墙！方靖身后的副官、卫士见势不妙，纷纷将他拽出澡堂，他犹在叫骂不已之时，澡堂塌了，几乎将他活埋！

各处处长听知此事，都惊慌不已，以为方靖会借此机会大杀特杀了，纷纷暗嘱参与澡堂赌博的下属赶快逃跑。不料事后

方靖只字不提此事，只将那些丢了枪栓的士兵押至军前，责令：“各打四十军棍，关禁闭三个月！”因为仅因聚赌，一次就处决几十人，传扬开去，他也要受谴责。既然这些人畏罪潜逃了，他乐得就此不了了之。

七十九军官兵惊呼：“又来了一个屠夫！”从此军纪肃然了。

其实方靖在“土木系”将领中，还算不得杀人不眨眼的“屠夫”。一九三九年夏秋之季，十八军十八师驻湖南益阳时，军医处有几个军医夜间打麻将，被师长罗广文抓获。罗广文将其中军衔较高的一名少校军医拖到公路上，亲自用手枪将其击毙。虽然军法中有“官兵同赌者杀”一条，但是因为打麻将而处决一名少校，这在军队中是比较罕见的。何况当时打麻将之风很盛，官僚、资产阶级家庭中早已视此为正当消遣了。更有甚者：一九四二年，十八军驻军四川三斗坪黎家湾，军长方天得到报告，说特务（警卫）营有一宿舍内正在聚赌。方天也不问其中是官是兵，有多少人，悄悄从另外的直属营调来两挺机枪，亲自督令向这个宿舍扫射。所以说，比较起来，方靖还算是宽厚的。

七十九军在桂林驻了一段时间，忽接军政部命令：部队开往汉中，将士兵及武器装备交汤恩伯，着该军长率各级军官去四川另行补充！

带兵官没有了士兵，犹如地方官没有地盘。士兵们也不愿并入别的部队，怕受歧视。因此，这一道命令使军心浮动。

部下们去问方靖作何打算，方靖不动声色地回答：“我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其实他内心的焦躁已到了极点，只不过因为身为将领，在军心浮动时，必须保持冷静。这

与作战时指挥官在任何危急情况下，都决不能流露出沮丧动摇情绪一样，否则后果便极为严重。

从个人得失来讲，方靖暗暗埋怨老长官陈诚，不该把他由六十六军调到七十九军；从部队来讲，七十九军有悠久历史，是经过战争考验的一支劲旅，现在显然是被何应钦肢解了，他感到痛心，但是，他敢埋怨陈诚吗？他能违抗何应钦吗？

方靖左思右想，不得不打电报向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郭忏求计。

过了两天，郭忏给方靖回电：“辞公已升任军政部长，你的事必有转机。”

原来蒋介石深感何应钦本兼各职太多，便对何说：“敬之啊，我看你太忙了，太辛苦了，还是保个人来接军政部长的职务吧！”何连忙说：“不辛苦，我忙得过来，忙得过来。”事隔数日，蒋介石又一次向何应钦重弹旧调，何终于知其“雅意”了。于是愤慨地说：“老头子又要分权给陈诚了，哼！陈诚是个什么东西！我当师长时他还不过是个炮兵连长。要我保个人，我就保墨三！”墨三是顾祝同的字。

蒋介石在何应钦推荐顾祝同任军政部长的报告上批了四个字：“辞修如何？”何应钦见蒋介石意决，不得不另写报告推荐陈诚。

果然，陈诚一上任，便收回了前令，又调七十九军进驻四川整训。部队刚进川，便授予警备权；不久又将暂编第二师和一四〇师拨归建制，由两个师扩充为四个师。这显然是陈诚有意以七十九军作为他的卫戍部队。

**进驻四川兼
任警备司令**

七十九军进川后，军部驻内江，方靖兼任内江和自流井两个专区的警备司令。

一九四师驻守内江至泸县两个专区一线；

九十八师先驻乐山专区（其中一团应西康行营主任贺国光要求驻西昌），后来移驻川东的万县、梁山一带；

一四〇师（师长朱继猛）驻重庆至达县一线，守卫川东北门户大巴山防线；

暂编第二师（师长沈开悦，后为石祖德）驻成都、温江、新津等地，并负责守卫机场。

部队驻防已定，于是方靖召开全军营以上军官会议，听取汇报，部署工作。开会期间，没有文娱活动，军官们闲得发慌，聚众赌钱。事为方靖所知，并得悉是军参谋长和副官处长带的头。这两个人在方靖到任第一天便持藐视态度，是方靖早已打算清除的。如今有此借口，方靖便亲率卫士排抓赌，将一个少将参谋长，一个上校副官处长抓获，禁闭一周，然后撤职查办。

岂料这参谋长原系夏楚中的亲信，被撤职后又跑到夏楚中那里混了个差事。这也是夏楚中欠考虑，方靖与他交厚，既是方靖撤职之人，便不该收留，收留了岂不使方靖难堪！于是方靖也要给夏楚中一个难堪。适值军需处长易大明报告：辋重营有一个连长期离队。原来这个连是夏楚中当七十九军军长时，调去为他益阳老家种田养鸭去了！这种事在军队中并不稀奇，本来可以马虎过去，可是方靖正在气头上，就命令军需处自即日起停发该连粮饷，并通知各处停止对该连一切供应，又命令辋重

营重新补充新兵再组一个连。

夏楚中在家乡的老太太对此事大为不满，要儿子谴责方靖不讲义气。夏楚中也感到难堪，但是，他自知理屈，这谴责的话又怎么说得出口呢？所以他只好设法给那一连的士兵在别的部队补上名字支领粮饷，安抚住老太太，对方靖则只字未提。

军官聚赌一事，使方靖警觉，他也感到部队生活不能太单调，于是在内江组织了两个剧团：忠勇京剧团和忠勇话剧团，除了在部队驻地巡回演出外，也在城市里公开售票演出。剧团的演员都在部队里补上各种级别的职务，以粮饷做为报酬，以售票收入作为剧团经费。副军长甘登俊不擅揽权，自愿管理这两个剧团事务，倒显得兢兢业业的，似乎乐得其所了。

方靖接任警备司令以后，第一件事便是武力胁迫原警备司令部警卫团接受改编。他得到确切报告，这个警卫团在原内江警备司令皋自举指使下，公然在内江至自流井一带遍设关卡，对行人客商搜身劫财，行同土匪。

陈诚惯于吞并杂牌部队，方靖受其薰陶，自然也是此中老手。他预先调集一九四师三个团埋伏好，然后指定该团在伏击圈内集合。该团列队完毕，伏兵四起，迫令放下武器。军官以卡车拉走，去他处集训，士兵整队点名。

该团在册人数是一千八百名，经点名证实的实际人数却不足一千名，也就是说空缺在八百名以上，其粮饷均被各级军官贪污了。

方靖自然了解军队中军官吃空缺是司空惯见，公开的秘密。但是一团人吃空缺达百分之四十七、八，却还是闻所未闻。如

何处置这件事？最简便的办法便是具实上报。但是，皋自举是毕业于保定军校八期的老资格，曾在黄埔军校任教，与方靖还有一点师生之谊哩。这样一个人，在上层能没有支持者吗？即使没有太密切的关系支持他，保定军校系统的人也决不愿意本系统的人丑闻传开。倘若被认为是蓄意打击保定军校系统，那后果就严重了。

方靖考虑再三，长叹一声：“算了吧！”他指示参谋处将该团士兵补充到各师，如此一“消化”，这笔空缺帐也就可以糊涂过去了。

然而皋自举却不能就此“算了”，他找上门来，对方靖哀求说：“抗战之前，当个少将就有三百六十块大洋的薪饷，生活过得何等富裕啊！抗战以后，物价飞涨，蒋先生不体下情，反要打折扣，发什么‘国难饷’，这叫我们如何过日子？总不能让家小沿街乞讨吧？昧着良心吃空缺也是出于无奈嘛！现在我这警备司令丢了，没有外快，今后的日子更不好过啊！”话锋一转，提出要求：“老弟高抬贵手吧——我仓库里还有几万斤大米，就让我拿去卖了做川资吧。”

真是得陇望蜀！方靖愣了片刻，叹口气说：“你是老前辈，我是你的学生，不能不从命。——你打个条子，我批一下，报销了事吧。”此时他只希望对方早点走，免得再提要求。

皋自举竟朝方靖深深一鞠躬：“啊呀老弟，如此盛德，真是我的再生父母了！”

方靖听了，不觉全身汗毛竦立！

不如意的事接踵而来!“报告钧座：辎重营有几十名士兵开小差……”参谋尚未报告完毕，方靖已勃然起立：“命令警卫营出动搜捕——抓回来一律处决！”报事的参谋连声“是、是”，直待军长发作完了，才又继续报告：“报告钧座，那些士兵是逃往青年军二〇三师，所以……所以……”方靖拍桌大骂：“混蛋！”把参谋吓了一跳，惶惶然闭住嘴巴。后来看出军长的神色并不象在骂他，于是莫名其妙地瞪着眼，不知说什么才好。

方靖挥挥手，参谋赶紧敬礼退出。他背着手在屋里踱来踱去，思考如何处理这件事。他刚才究竟骂谁呢？是那些开小差的士兵？是那些管束士兵不严的下级军官？是收容逃兵的青年军？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他现在的感情极其复杂。

他当过兵，知道当兵的疾苦。二十五年前他在粤军中当兵，每月六块的伙食费。二十五年后的一九四五年，军队士兵的伙食费仍旧是每月六元。一九二五年黄金售价每两四十元，到一九四五年黄金售价已高达每两三万元，物价何止涨了百倍！这六元钱能买到什么呢？岂不是到了食不充饥的地步吗！至于士兵每月那几块钱纸币的薪饷，用士兵的话来讲，是——用来擦屁股都嫌打滑！若不是军粮保障供给，士兵恐怕连稀粥也喝不上。

方靖当了二十年带兵官，他知道士兵逃亡的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非人待遇，一是被抓当兵后亲属生计无着。他自信在他的部队里，非人待遇之事不会发生；七十九军的士兵以湖南、湖北人居多，现在家乡已沦陷，逃跑回家不大可能。

这一回逃跑竟是从一个部队逃到另一个部队中去了，是十分反常的现象，对他来说也是极大的侮辱，所以他愤慨！

青年军是抗战中期蒋介石以“抗日救国”名义招募来的大、中学生组成的军队，共八个师（二〇一至二〇八）。蒋介石对这些知识兵恩宠备至，一般部队的士兵赤脚穿草鞋，青年军的士兵却穿皮鞋；士兵享受军官待遇，每人每月伙食费二十六元——是一般部队士兵伙食费的四倍半！

这就是七十九军辎重营士兵开小差的唯一原因。方靖的怒气膨胀到几乎要爆炸的程度！他唤来副参谋长孟祥武：“你通知二〇三师，叫他们马上把我的士兵送回来，否则我要诉诸武力——倒要看看他们那些吃二十六块钱伙食的士兵能不能抵挡得住我这些吃六块钱伙食的士兵的进攻！”

这件事传扬开后，对七十九军各部队都有极大影响。如不采取措施，士兵继续逃跑将不可避免。方靖心生一计，又派孟祥武去找内江县长谈判：“我们把士兵的菜金交给县政府，由他们代办部队每天的菜蔬、食油。你告诉县长，要想彼此相安无事，只能答应我们的要求，认真帮助部队办好伙食。”

县长自然不敢抗拒驻军提出的要求，何况方靖兼有警备大权。这样做确实改善了士兵的伙食，但是却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压在老百姓头上的种种苛捐杂税又加了一项——驻军伙食补贴费。这免不了要受到舆论界的抨击，却也没有发生什么麻烦。当时国民党最高政府近在咫尺——距内江不过百十公里的“陪都”重庆，很难设想对此会一无所知，但是他却没有受到最高当局的谴责，这只能看做是最高当局对此殃民之举的默许。

是年七月，方靖因公去重庆，见到了军政部次长林懋文。此人曾于一九二九年任过十一师三十二旅旅长，也算是“土木系”的将领，方靖可以和他无话不谈。

方靖对林懋文说：“你我戎马半生而有今日，全仗辞公提携。现在辞公把我的部队调进川来，寄予很大希望。倘若部队因为伙食待遇而解体，如何对得起辞公？又有何面目见十八军袍泽？再者，部队里每有吃空缺之事，均以贴补士兵伙食为借口，查着了也不好处理，此风不能杜绝，兵员难以保证。兵员不足，又如何打仗呢？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我宁可不当这个军长，也不能效法别人以空缺来弥补士兵伙食！”

这位军政部次长听了竟然大惊失色：“唉呀！有这样的事情吗？”方靖默默无言，他在暗想：你离开部队日久，高高在上，养得脑满肠肥，哪里还会关心士兵的疾苦呢！假如林懋文不肯帮忙解决待遇问题，他真打算撕破脸皮吵一架。幸好林懋文也感到事情严重，一口答应：“你放心好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这样吧，从八月份开始，伙食费与青年军相同，起码嫡系部队要拉平！”

尽管伙食拉平了，但是七十九军与青年军二〇三师同驻一地，摩擦日深。

一九四五年八月，方靖奉命前往重庆陆军大学甲级特别将官班第三期受训。在他受训离职期间，军部移驻宜宾。方靖又兼任了叙（宜宾专区）泸（泸州专区）警备司令。

宜宾位于长江上游岷江与金沙江汇合处，当时交通仅限于水上运输，算是个偏僻的小县。

由于七十九军兼有警备任务，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所以军直属部队警卫营经常出动巡逻，参谋处二科（负责收集军事情报工作，但不属军统特务组织）的便衣人员，也常到大街小巷活动。当时虽是抗战胜利之初，“国军”已把“反共防共”作为首要任务。

一个惊人的消息

十二月初某日，参谋处二科便衣人员报告说：“城里发现一些行迹可疑分子！”二科立即向副参谋长孟祥武报告，孟祥武又向副军长甘登俊报告，顿时紧张起来。

甘登俊和孟祥武召集参谋人员研究多时，最后决定派出更多的便衣继续跟踪，并下令军直属部队紧急戒备，以便至晚出动拉网捕人！

正当军直属部队全副武装集合操场待命行动时，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跑来，十分尴尬地向甘登俊和孟祥武解释：街上发现的行迹可疑者，乃重庆派来的特工人员。孟祥武再三追问特工人员此来的目的，他才吞吞吐吐地说：“委员长可能要来宜宾视察！”这真是晴天霹雳，惊得甘登俊和孟祥武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半晌说不出话来。孟祥武再问蒋介石到宜宾的确切日期，稽查处处长推说不知。

孟祥武是东北人，一向以脾气暴躁著称，对这个稽查处处长却无可奈何。因为稽查处处长名义上属警备司令部领导，实际上直接听命于军统——后归西南行辕二处。在最初一段时期，军统甚至在宜宾郊区设立秘密小组并有电台，搜集七十九军内部情报向重庆报告，可谓嚣张之极。方靖从陆大毕业归来，得悉

这一情况，十分恼火。正值有一次稽查处搞了全城突击戒严检查，事先并未请示警备司令部，方靖便借题发挥，把处长叫来训斥：“我是警备司令，你们的一切活动只能在我批准后才能付诸实行。希望你好好了解一下我这个人、我这个军的历史，你就会明白应该怎样尊重我们了！”以后，他们的行动才有所收敛，秘密小组也灰溜溜地撤走了。

尽管还不知道蒋介石什么时候到来，接待的准备却刻不容缓。从何入手呢？方靖不在家，甘登俊和孟祥武都没有见过蒋介石，更谈不到接待视察的经验了。于是孟祥武召集了军部的副官、参谋、军务、军械、军法、军需、军医等处处长共同研究。这些人更无经验，也无办法。他们只是议论蒋介石来此的目的，以及对七十九军的得失，自然也谈到了他们自己的得失等问题。孟祥武看看耗了大半夜却一点办法也想不出，又气又急，终于把心一横：“好了，你们都听我安排吧！”

孟祥武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十期、陆大十七期，是个颇为能干的人。到底年轻，缺乏经验，接待准备工作过多地注意了环境卫生，却忽略了许多极重要的注意事项。比如：军事训练的情况，部队的部署和应变措施，驻防地区的民情和社会各阶层的动态，这些都是实质性的问题，也可能是蒋介石视察的主要内容。这些问题的各项内容，应该落实到各主管部门作好准备，以备蒋介石考查。但是，这些事项孟祥武都忽略了。他热衷于表面工作，在内部，他发动大搞军官乃至士兵的宿舍内务，实际上军人的内务本来是保持整洁的，蒋介石也决不会不辞劳苦跑去兵营视察士兵们的生活区；在外部，他把宜宾县的戴县

长叫去，要求“把老百姓都从家里赶出来大扫除”，“家家户户门前必须悬挂国旗”，“委座到时必须放鞭炮，夹道欢迎”，还必须“高呼蒋委员长万岁的口号”等等。于是整个宜宾县城被搞得老少不安，街头巷尾民怨沸腾。

在宜宾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县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是稀有之物，因为这个县历史上还找不出悬挂旗帜的记载。宜宾城内倒有一家锦旗店，平时由于生意清淡，已濒于倒闭。这天却时来运转，若不是人手太少，很可以发一笔横财；也正因为锦旗店供不应求，绝大部分居民在限时做到的紧迫情况下，只好买布自己动手做。于是宜宾最大一家百货店宝元通公司门前排成长龙，都是购买红、蓝、白布的，甚至通宵不能关店门。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竟使国民党宜宾县党部这个平时鬼都不敲其门的衙门，半夜三更门庭若市。原来许多居民还闹不清“青天白日满地红”的那个“日”是多少个角。县党部当时正在关起门来研究蒋介石来到时，该如何“发挥积极作用，以引起总裁重视”的问题，乍一闻报，惊得那些党棍老爷们几乎闭过气去！一遍吼叫咆哮之余，感到事态严重，便又纷纷叫嚷必须派人去挨家挨户通知：“那个‘日’是十二角！谁要弄错了严办不贷！”但是，这个衙门向来是拿钱的人多，办事的人少，何况这深更半夜，哪个愿意去干这种差事？吵吵闹闹到天亮也没有派出一个人。等到大街上挂出了旗帜，上面那个“日”歪歪斜斜，八角、九角到十二角的都有，县党部的人才真的急了，又一窝蜂似的拥上街头，跳脚胡骂一气，还勒逼警察局“把捣乱分子抓起来”。但是，不合格的旗帜竟是如此之多，哪里能抓那么多

人呢？后来还是宜宾地方上一个很有点权威的人出面劝说：“要改已来不及，闹下去反引为笑谈。蒋委员长来，不过是走马观花，那里会去数每面旗帜上的‘日’是多少角！家丑不可外扬，算了吧！”此人叫吕超，曾在孙中山的大元帅府任过参军，是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也算个“元老”。经他一劝，县党部不敢再咋唬了。

七十九军司令部也闹腾了一夜才算把环境卫生和内务整顿好，尽管官兵们都很疲劳，却不敢休息，因为没有任何人知道蒋介石到达的准确时间。军官们都戎装整齐，士兵们全副武装，时刻准备出动。

连队每天两餐饭，早上九点和下午四点。由于不知蒋介石何时到达，竟不敢举火，饥肠辘辘，等到中午十二点稍过，忽报天空出现两架飞机。孟祥武急忙传令直属部队跑步去机场，甘登俊则带领各处官佐骑马奔去。但是，那两架飞机只在机场上空盘旋有顷，作蜻蜓点水游戏以后，便向西飞去，丝毫没有回眸留恋之意。此时七十九军直属部队尚在机场的三分之一途中。由于无法判断飞机是否还会回头，孟祥武坚持带队跑到了机场。

其实这个荒废了多年的机场，当时并无地勤设施，根本不可能降落飞机。孟祥武及其参谋人员被“领袖莅临”搞得头脑极度混乱，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们跑到机场时，已是疲劳不堪，却接到稽查处通知：下游驶来一艘军舰，“委员长可能在军舰上”！这个东北将领不禁破口骂娘了。骂是骂，苦头还得他带头吃。他跳上马，一挥鞭：“跑步赶去！”

当直属部队在江边码头列队时，士兵们的新军装从上到下都被汗水湿透，仿佛刚刚经过武装泅渡演习。

孟祥武深恨稽查处故弄玄虚，县党部隔岸观火，于是命令卫士排严密警戒：“不许那些王八蛋靠近！”他和甘登俊上了军舰。

军舰停在江心，甲板上站满了侍从官和宪兵。甘登俊和孟祥武坐小船摆渡靠拢军舰，经侍从官请示蒋介石后，才允许他们登上舷梯。

侍从室主任俞际时在舷梯口迎着他们，带领他们走进军舰的餐室。

蒋介石穿一身黑色中山服，坐在靠餐桌的椅子上，宋美龄坐在他的身边；餐桌的另一边坐着一身戎装的白崇禧。

甘、孟二人过去也曾远距离看见过蒋介石，至于宋美龄和白崇禧都还是初次见到。由于军人行注目礼必须正视前方，他们便有机会把蒋介石仔仔细细看个一清二楚。在他们的印象中，记得最清的，是蒋介石身着戎装、胸前挂满了花花绿绿勋章的照片。这大概还是“蒋总司令”时期的留影，黄埔系将领家里都挂着这样的照片，上面还有蒋介石亲笔题字：某某同志存——蒋中正赠。显然，这张照片是他在最得意时期拍的，神气活现，颇有威仪。他们也见过蒋介石穿大礼服和便装的照片，前者过于做作，颇似拍的塑像；后者又失于不甚端庄，有损“领袖”形象。而现在活生生的蒋介石就坐在五步之内，却与他们印象中的人似是而非，秃顶周围的一圈短发全白，虽然由于保养得极好而红光满面，可是明显的皱纹已布满额头；下眼皮仿佛微

肿，一道深沟形成的皱折，就象戴了一副小眼镜。

宋美龄穿高领旗袍，虽然脸上匀着胭脂香粉，却也掩不住徐娘半老了。

桂系军阀头子白崇禧，在戎装衬托下倒有点气派。这个曾经主谋逼蒋介石下野东渡的人，韬光养晦，在蒋介石夫妇面前装得一副俯首听命的样子，俨然是“委座”的“忠实信徒”。

蒋介石向甘、孟二人询问了一些军情和民情，然后又问二人：“唔——这个这个……你们看我要不要上岸去看看呢？”孟祥武心想：“我们拼死拼活忙了两天，你要不去看看，岂不白辛苦一场？”于是抢着回答：“请委座登岸视察，部下保证万无一失！”蒋介石稍稍犹豫后，便点头同意了：“好的，你们去准备准备吧！”

蒋介石视察 七十九军

宜宾县历史上第一辆汽车出现在街头，是在一九四六年三月，方靖由陆军大学毕业归来时，从泸县用轮船装来一辆美制军用小吉普。蒋介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中旬到宜宾的时候，尚无汽车可坐，按其戎马半生来讲，备匹战马即可。但是，当时他已整整六十岁了，而且有宋美龄作陪，骑马显然不相宜。这一点孟祥武是想得很周到的，事前向宜宾绅士家里借了三顶轿子，把三个人抬了起来。

“夹道欢迎”的老百姓，在大量便衣人员带领下喊着“万岁”的口号，家家商店点燃了鞭炮，场面显得热烈已极。这大概是蒋介石未曾意料到的，只见他坐在轿中向两旁频频招手，喜形于色，颇有点飘飘然了。

轿前有军司令部警卫营长萧炳文提枪引路，轿旁有甘、孟

二人握枪保驾，轿后有精锐的军部卫士排紧跟，再加之蒋介石的侍从官们扶轿而行，真是威风凛凛，有如皇帝出巡。

卫士排的后面是七十九军司令部的官佐队伍，由副官处长带领，走得十分整齐。跟在这支队伍后面的，是那些县政府、县党部的老爷们。这些人平时在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不可一世，此时一个个缩肩低头，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其中以宜宾县长戴某最是心怀鬼胎，当蒋介石要登岸的消息证实后，他便苦苦哀求萧炳文：“倘若有刁民拦轿喊冤，务请老弟派兵拦挡，事后兄弟自有谢仪。”原来戴某到宜宾当县长后，宜宾百姓都说：“戴县长来了一年，宜宾地皮矮了三尺！”可见其如何残酷地搜括民脂民膏。

其实戴某的担心纯属多余，七十九军直属部队由江边到司令部的一条马路两边，几乎是三步一岗，一些较高的建筑物上，还架有机枪。再加上警察和蒋介石带来的宪兵连补充警戒，织成了一道密网，根本不会容许百姓挤进人行道，更谈不上闯到轿前“拦轿喊冤”。

在七十九军司令部门外，军士队列成“□”型纵队；军部军乐队奏起了军乐。蒋介石夫妇和白崇禧在五米以外下轿，由蒋介石举着文明棍带头检阅这支队伍。

军士队是七十九军举办的集训组织，其学员来自所属几个师的连队中的中士、上士级军士（班长、副班长）。这些军士训练有素，而且多是经过战阵的，是士兵中的尖子。经过集训后，再分发到各连队当下级军官。因此，这支由军士组成的队伍不同于一般连队，显得特别精壮。蒋介石看了惊讶不已，当即回

头问孟祥武：“这是不是青年军？”孟祥武回答：“报告委座！这是敝军的军士队。青年军二〇三师远在几百里以外的泸县一带。”孟祥武所以指出二〇三师远在几百里以外，在于告诉蒋介石：我们不是临时借部队来欺骗你。因为借兵应付视察的事，在国民党军队中很普遍。

蒋介石没有向军士队训话，只连连称“好”，便走进了司令部。

司令部中心是一块面积约二百亩的练兵场，三面平房，住着直属部队。迎面大楼是司令部九大处的办公所在地。军长、副军长、参谋长等人的办公室及会议室均在楼上。按原计划是将离职未归的军长方靖的两间办公室和尚未到职的参谋长办公室腾出来接待蒋介石等人，这已经足够了。不料蒋介石登楼后，侍从官便把守了楼梯口，连甘、孟二人不经传唤都不准靠近，真是喧宾夺主！

甘、孟二人经过一天折腾，加之肚内无食，自然疲劳不堪。侍从官不让他们上楼，他们倒乐得在参谋处以半躺的姿势靠在沙发上稍事喘息。

甘登俊已年近花甲，一靠下就软得象摊泥。这个江西将领呻吟般对孟祥武说：“老表啊，实在有些吃不消了，回头有些事你多支应着些吧。”孟祥武边捶着腰腿边说：“副座，现在是箭在弦上啊，就是一口血喷出来，我们今天也得拼死应付到底！”甘登俊双手拜佛却口称“上帝”：“上帝啊，保佑保佑吧，让委座今天也稍事休息，有什么事明天再办吧！”

然而“上帝”却不肯无端保佑这个可怜的人。话犹未尽，

侍从官来到：“委座召见你们哩。”这两个疲惫不堪者象触了电一样蹦起，迅速整装，飞快登楼。

蒋介石夫妇在方靖的办公室里，一个坐着修理尖尖的指甲，一个悠然自得地踱着方步。他们显得精力充沛，情绪极佳。

甘、孟二人敬礼后，齐声说道：“报告委座，部下应召来到！”

蒋介石出其不意地提出一问：“宜宾附近制高点在哪里？”孟祥武回答：“报告委座，制高点在翠屏山——那里驻有敝部炮兵营，还有一所女子中学。”“唔，唔，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我要去看看——马上就去，你们布置一下吧。”

甘、孟二人听了蒋介石的吩咐，不禁暗中叫苦。君令不可违，只得硬着头皮答了个“是”字，赶紧下楼去准备警戒事宜。

原来在七十九军进川之前，七十六军军部曾在宜宾驻防。由于其直属部队以“下乡剿匪”名义对农民骚扰过甚，引起农民暴动。一些农民头包红布，手持大刀，组成号称“刀枪不入”的大刀队，一直杀到七十六军司令部，砍死了卫兵，冲入了营房。当然，在现代化武器的反击下，大刀队被残酷镇压了。据说翠屏山是这支农民武装的集结地点，所以七十九军进驻后，便认真搜过山，并派炮兵营驻守。现在蒋介石竟然要去登山，倘若有半点差错，甘、孟二人的头颅就有点不牢靠了。他两人怎会不惊不怕呢？

直属部队待蒋介石进入司令部后，才收岗回营房，已是下午两点多钟了。他们估计蒋介石不会再有什么行动，便准备吃饭。却不料刚刚解下武装带，又接到命令：“紧急集合——跑步

沿途至翠屏山警戒！”要不是直属部队经过战阵，训练有素，真应付不了如此疲劳的紧急任务。

孟祥武这一回也跑在前头。他倒不是担心警戒有误，而是灵机一动，忽然想起对那位颇能左右蒋介石的宋美龄应该拍一拍。他飞奔翠屏山，到女子中学对校长说：“回头委员长和夫人来视察，你要带头喊口号。除了‘委员长万岁’必喊之外，还要喊‘蒋夫人万岁’。这点至关重要，你千万不能忘记！”

孟祥武首先将蒋介石夫妇领进女子中学。学生们在校长带领下，果然三呼“蒋夫人万岁”，使宋美龄大喜过望，当即赏赐四百万元，“给学生们添点文具，改善改善伙食吧。”事后蒋介石犒赏七十九军警卫营也不过两百万元，足见宋美龄出手大方得很。

从翠屏山回到军部，已是五点多钟了。冬季日短，蒋介石在楼下参谋处转了一圈上楼，已是需要灯火照明了。

孟祥武跟上楼去，得到蒋介石夫妇的夸奖，并且许诺：“等有机会保送你去美国深造。”孟祥武感激涕零之余，再献殷勤：“敝军办有忠勇京剧团，请来西南名伶演出，技艺具佳。委座和夫人若有雅兴，可以传剧团来司令部献演。”蒋介石频频点头：“好的，好的。”

孟祥武飞奔下楼，动员各处官佐立即把练兵场的指挥台加宽搭成戏台，又命人去传京剧团立即到司令部来准备演出。他还亲去伙房监督做菜。因为虽然征用了城里几家饭馆的厨师掌勺，菜肴滋味可保无虑，但是还要防备有人下毒。

司令部里顿时忙乱起来。

戏台在搭着，演员正在化装，菜肴也已摆好。正准备去请蒋介石夫妇下楼进餐，然后看戏，白崇禧的副官来传孟祥武。当他飞奔上楼一看，不禁诧异：刚才还见到到处都是侍从官的，现在怎么一个人影都没有了？见了白崇禧，这位大员对忙昏了头的副参谋长说：“你不要瞎忙了，委座和夫人已经回军舰了。你马上集合军官，我要训话！”

原来蒋介石夫妇趁司令部忙乱之际，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溜回军舰上去了。司令部营门口的卫兵只负责“闲人莫入”，并不管谁出去，难怪蒋介石走了也无人报告。策划蒋介石悄悄离去的人，显然是摸透了军队中的办事规律的。

军官集合在操场，白崇禧对他们训话一小时又十分。其内容无非是“抗战胜利后，我军主要任务便是防共反共”之类的话，自不免唾沫四溅地胡骂一通。最后命孟祥武派警卫营送他回军舰——连白崇禧也不肯在军司令部食宿。

军直属部队又被派去沿江放哨，不准任何船只在江中活动。

次日一早，甘登俊、孟祥武率领各处官佐赶到江边，想上军舰再见蒋介石一面，不料军舰已经起锚，蒋介石和宋美龄、白崇禧在甲板上，挥着白手套算是告别了。

一场兴师动众的“视察”，戏剧性地开始，却还不能就这样戏剧性地结束了事。

再说方靖在重庆陆军大学受训，频频接到部下报告蒋介石视察七十九军的情况，并且得到纷纷称赞。陆大同学也都说是件好事。当然，蒋介石能去视察某一部队，应视为无上光荣，也可能在视察后对其将领有所升赏。然而方靖老谋深算，并不那

么高兴。当他读到部下报告一些准备迎接视察事宜，便不住摇头：“纯属庸人自扰！”随后又接到孟祥武详细报告视察经过，便跌足说：“唉，竖子误我！”又得知准备晚餐及看戏之事，便叹息：“多此一举啊！”

果然不出方靖所料。

四见蒋介石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中旬，陆大将三期结业，蒋介石在重庆南岸黄山官邸设便宴招待方靖、俞际时、关麟征、王凌云、杜聿明等人，宋美龄作陪。

蒋介石不吸烟，不喝酒，部下们在他面前自然也不敢吸烟喝酒。而且与他同桌十分拘束，所以大家都希望尽快敷衍完事。不料席间蒋介石突然向方靖提出指责：

“你的七十九军是怎么搞的？我看了你的参谋处，连一张万分之一的地图都没有！一个部队到一处驻防，首先应该绘制地形图，其次是有周密的应急计划。譬如遇有敌人突然袭击，便可以按预定应急计划采取军事行动，不至临时束手无策。我问过你的参谋人员，他们都对答不上来。这样的参谋处，怎么能够成为神经中枢呢？我没有想到我们的嫡系部队竟会如此落伍！”

方靖顿时面红耳赤，惶惶起立。所幸他在得到部下报告后，早有精神准备，所以勉强应对：“校长指责得很是。”这里他又使用了“校长”的称呼，并且首先肯定承认对方“指责得很是”，然后再辩驳，就显得不那么强词夺理了。“部队刚进驻四川，学生便奉命来重庆受训；军部由内江移防宜宾，学生已离开部队

日久，部下们难免有玩忽职守之处。当然，学生并不能推卸平时引导无方之责。此外，七十九军进川前便没有参谋长，以至参谋处的工作有所疏漏。请校长放心，学生归部后一定加紧整顿参谋处。”

蒋介石听着听着，脸上逐渐露出了笑容。显然雷霆之怒被方靖一番巧辩安息了。“唔，唔，好，好……”竟没有继续指责。

方靖可谓料事如神，却没有料到他归部后正要着手准备整顿参谋处时，发现孟祥武精神恍惚，心事重重。问其原因，原来是为了蒋介石曾许诺保送他去美国深造之事，迟迟没有下文，颇有点单相思。方靖得知这事后，不由得哑然失笑。暗想，“真可谓无独有偶！”这与当年李守维何其相似啊！

方靖现在当然不能把当年李守维的事告诉孟祥武，来说明蒋介石经常开空头支票；他只能好言相劝：“委座军国大事系于一身，哪能记得曾经许诺过的每一件事呢？做部下的总不能跑去质问他吧？你还年轻，好好干，深造的机会多得很。这样吧，以后有机会，我一定设法保送你就是了。”

孟祥武又感激涕零了。他在不知不觉中，又得了方靖一张空头支票。

这次蒋介石到宜宾视察，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为了躲六十大寿才离开重庆的，这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他去西安躲五十大寿的说法相吻合。但是众所周知，那一次他去西安的目的，主要是勒逼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跟着他倒行逆施，置外寇于不顾而去“剿共”，假如真有“躲寿”一说，也不过是

个幌子而已。既然十年前在西安遭遇“双十二”事变，十年后他不敢住在嫡系部队兵营里就可以理解了。另一说法是，抗战结束不久，国民党政府急于由陪都重庆迁回首都南京，对于四川这天府之国的大后方，必须交一可靠的部队防守。因为四川不仅是蒋介石的后方基地，而且军阀势力甚强，如无可靠的嫡系部队驻防，便有后顾之忧。七十九军尽管是陈诚精心布置在四川的，蒋介石仍不放心，还是要亲自视察一番。

从后来七十九军在四川驻防四年之久来看，蒋介石这次视察对七十九军是甚为满意的，所以后一种说法比较合理，但也可能是以“躲寿”为幌子吧。

至于蒋介石在视察后对方靖提出指责，那也是必然的事。这并不能说明他视察后的主要观感，只能解释为用以显示他这位校长比任何一个学生都要“高明”。

结交袍哥
求太平

方靖在重庆陆军大学甲级特别将官班第三期受训的时候，结识了四川军阀杨森的儿子二十军军长杨干才。交谈中，杨干才知道他兼任警备司令，就摇头冷笑说：“你一个下江人，能整治得了四川人吗？”方靖正为此苦恼。因为他虽然当兵二十五年，各级军官都干过，但是却从未兼管过地方事务。警备司令部有地方行政权，负责地方治安，也就必须与地方上各种势力较量。尽管他还没有接触过恶霸地头蛇，但是这些人的潜在势力和能量，他已“久仰”，如果与这些人的关系搞不好，在地方上就很难打开局面。杨干才谈到这个问题，他慌忙请教。

杨干才对方靖的来历自然是很清楚的，现在有这样一个人

向他请教，不免得意非凡，缩起袖子，唾沫四溅地谈开了：“既然老兄下问，小弟就直言了，不怕你生气。你掌握一个军，算啥啊！强龙难斗地头蛇嘛！你要想把四川整治得风平浪静，不能光靠军队，主要要靠地方上的袍哥大爷。你们这些嫡系将领动不动打官腔，开口就是啥子‘土豪劣绅’！啥子土豪劣绅啰，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要想发财，你不霸道，能发得起来吗？你若硬要跟袍哥作对，这些人你逼急了，他朝草鞋磕个响头，道声辛苦，抬脚走出百几十里，你就找不着他了。等你不提防，他又回来了，暗地里跟你老兄涮镗子（捣乱），你老兄就是有十万雄兵也难对付哩。你老兄要是把袍哥安抚好了，即使地方上有个风吹草动，请袍哥出面‘拿言语’（打招呼），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跟你老兄说明白：有些袍哥大爷跟小弟拜过把子。你只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小弟跟他们送个消息去，保你得个金娃儿（发财）！”

这个少爷将领的言语虽然粗鄙，却使方靖悟到：要使地方太平无事，必须与恶霸地头蛇勾结。早在黄埔军校受训期间，他的脑子里就灌满了“中国只有大贫小贫，没有阶级之分”的说教。尽管他出身贫寒，当了这么多年的军官，已把当年苦况忘记了。何况他所崇拜的蒋介石，在上海不得志时，不也曾拜倒在青红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的门下吗！这样一想，他现在就不以与恶霸地头蛇结交为耻了。于是他通过杨干才与宜宾地区的袍哥头子闵锡如、黄叔平接上关系。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下旬，陆大将三期结业，方靖由重庆返回宜宾途中，因搭乘青年军二〇三师参谋长赵秀昆的吉普车在

璧山翻车受伤，住进重庆中央医院。伤愈后于一九四六年三月下旬返回宜宾军司令部。稍事料理军政事务，便派副官将杨干才给闵锡如、黄叔平的信送去。

闵锡如、黄叔平虽然同是袍哥头子，但是势力范围不同。闵锡如结交军阀、财主，几乎与四川各地帮会均有联系。黄叔平的势力仅限于宜宾地区，其党羽多是下层三教九流之徒。他们有同一的生财手段，那就是以贩运棉花、食盐做幌子，干贩运大烟的罪恶勾当。他两人接到杨干才的信，真是心花怒放，以为方靖是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合作，今后大有可为了。两人商议摆下丰盛筵席，宴请方靖及副军长、参谋长等人，地点选择在黄叔平家。这里黄叔平还有一个如意算盘，诱使方靖将在商业街的公馆迁到他家里来。

国民党军队每到一地驻防，首先扰民的倒并非士兵，而是军官。军队尚未抵达驻地，“打前站”的副官处副官们先到，第一件事便是为军官家属号房子。所谓“号”，即是在居民的住宅门上用粉笔写上几个字，指定这一门牌中哪几间房子被征用了，不管房主愿不愿意，都必须腾出来，毫无商量余地。而且征用房子不管住多久，一律不付房租。号下的房子是分等级分配给各级军官家属的。以一个军来讲，军长、副军长、参谋长的公馆，都必须是当地最好的房子，而且要独门独院，因此被“号”中的房主，不得不全部让出。又因为军队流动性大，所以不备办家具。于是被“号”中的房间内的家具摆设，也在“征用”之列。

黄叔平家的住宅，在宜宾可称得是第一流的。前院有花

园，东、西、南三面是平房，北面是一座两层小楼，楼后还有一所四合院。尤其是地点好，紧靠城边，既不嘈杂，又离闹市不远。当初这所房子也是被“号”中的，而且指定为方靖的公馆。方靖的夫人任秀珍听说是流氓头子的家，坚决不肯住，才另选了房子。黄叔平风闻此事，颇为失望。他另有打算，因此别人生怕房子被“号”上，他却希望方靖住进。现在方靖找上门来，他便以为有了希望，只要方靖愿意，他准备把这所住宅奉送，借此与这个铁腕人物建立起不同一般的关系。

宴会时间订在某天下午一点。闵锡如一早就带了他那帮人来黄家坐等。十二点以后，请来陪客的宜宾当地绅士名流也都到齐了。黄叔平穿好长袍马褂，坐立不安地进进出出，只盼方靖等人早来，以便列队相迎。

一点早已过去，两点也留在后面了，主人、陪客正在望眼欲穿之时，突然外面传来一阵整齐的跑步声。人们正在诧异，一队头戴钢盔、跨着盒子枪的士兵闯入，在花园列队之后散开。于是黄家住宅内到处都是岗哨。

闵、黄二人惊得面如土色，不知这一队武装士兵闯入意欲何为。闵锡如更是心怀鬼胎，因为就在前几天，他派出一队人贩运大烟，途经内江，被内江警备司令部（一九四师师长龚传文代司令）扣押。现在又出现如此场面，他唯恐方靖预谋除掉他们。

正在主人、陪客惶惶不安之时，一个中尉副官跑过来喊了一声：“方司令驾到！”

方靖带领着副军长、参谋长等人昂首而入。在他们的身后

还跟着一大群副官、卫士。

现在的方靖，装束已不似当初在鄂西山道上那么寒酸了。他穿上了毛料将军服，领章上两边各有一颗金星，标志他是将级军官；肩章上各有两颗金星，标志他是中将军衔。前有四排勋标，标志他曾受勋四次。十字宽皮带上挂着佩剑（谓之“中正剑”）。

真所谓“人在衣裳马在鞍”，尽管方靖遭车祸后更消瘦了，但在这种装束下，却显得十分盛气凌人。

那一群绅士名流原本准备列队相迎，自然也准备好了见面时一套阿谀奉承之词。但是由于一系列意外出现的情况，早把他们吓得目瞪口呆。直到方靖登堂入室，往沙发上坐定，这帮人才如梦初醒，蜂拥而入，只知朝这个铁腕人物鞠躬，一句奉承话也想不起来了。

方靖傲然上坐，以一种能够主宰对方命运的姿态，审视着面前这帮人。这一来，使虚胖的黄叔平和干瘪的闵锡如都满面冷汗。

沉默的僵局延续了足有一分钟。

闵锡如到底比黄叔平见过世面，竭力控制住自己以后，陪笑着说：“杨军长给兄弟的信上说，方司令官一向爱民如子，贵军纪律严明。能有方司令官来我们这一方当政，是我们这一方老百姓的福气啊！”

方靖微微皱起了眉头。因为他总觉得自己身为党国高级将领，与这些不三不四的家伙打交道，实在于心不甘。于是颇为生硬地说：“我是军人，戎马半生，只会带兵打仗。光复以后，

本应以休整部队为主，无奈蒋主席又委以重任，做部下的也只好勉为其难了。我们的宗旨是：只要不危害党国的利益，能与驻军合作，其它一切概不深究。”他说“蒋主席”三字时起了起身，在座军官都站起立正——完全是条件反射，弄得袍哥们也慌乱地跟着他们学样。

闵锡如见话不投机，便使眼色让黄叔平赶紧摆宴，因为他以为三杯黄汤下肚以后，原则和假面具都会被冲走。他却不知道方靖是个不沾烟酒的人，这一着难以奏效。

刚刚入座，闵、黄二人便举杯向方靖敬酒。方靖的副官在一旁说：“我们军座不喝酒。”方靖对副官说：“你替我喝了，以谢主人高雅之情吧！”副官便替方靖与对方碰杯喝了酒。

满桌山珍海味，方靖连筷子也不伸。稍坐片刻，便起身说：“军务在身，不能久留，来日我请诸位吧！”说罢，也不等主人挽留，便与副军长、参谋长一齐走了。满院子的士兵自然也跟着撤走。

黄、闵二人及所有陪客都傻了。突然一阵哈哈大笑把他们惊醒，这才发现尚有一位上校未走——七十九军上校副官处欧阳处长。

欧阳招呼着众人：“来，来，来，我们都坐下吧。”等袍哥们都惶惶不安地入座之后，他才又说：“我们军座今天能来一趟，已是给两位不小面子。象这样庞杂的宴会，他如何好多逗留呢？所以委托我来与诸位尽欢而散。来，来，来，我敬诸位一杯！”

黄、闵二人这才恍然大悟：邀请的陪客太杂，有辱司令官的身份；人多不便交谈，只宜少数人得知。但是，他们又不解：

既然如此，何不早通知一声，而要弄得如此紧张呢？

原来方靖此来的目的是有意向对方示威，不能就范便以刀枪相见；虽可接触，但不能忘记彼此身份。这一着的效果是好的。欧阳在酒筵上向两个流氓头子提出警告：“今后必须听从警备司令部命令，主动协助军方控制局势，不得有骚乱发生，还要将各社会团体不利于政府和军方的言行及时报告。”这时，黄、闵二人只得喏喏连声。

黄、闵二人第二次宴请方靖时，席上无一陪客。方靖虽然未与对方谈什么秘密，订什么同盟，却在散席后对闵锡如说：“内江警备司令部扣押了你的人和货物，我已命他们释放。你那些人所带的枪枝是不能还的。今后望你行动慎密，不要使我们为难啊！”这一小施恩惠，使闵锡如感激涕零，口口声声愿为方靖效死。

由于有这些地头蛇的协助，七十九军司令部在宜宾驻扎期间，基本上是平静的，只发生过一次与商会的冲突。事情是这样的：通讯营要办一个无线电训练班，派营部副官去商会借桌椅。商会一个常委流露出为难情绪，这个营副官便给了他一记耳光，于是引起轩然大波。县商会召开紧急会议，发动罢市抗议。当时对此事军方多数人持强硬态度，军参谋长陈瑞鼎主张：“他罢市，我戒严。商人靠做生意赚钱，我戒严三天，他们坚持不住，就会来讨饶！”方靖不许，却让闵锡如和黄叔平去“拿言语”，结果仅罢市半天便恢复了正常。这件事方靖做得很对，因为他兼任四个专区警备司令，是很使人眼馋的，早有人在暗中窥视破绽，企图轰他下台。

罢市消息，第二天便在重庆、成都的报上披露了。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做文章，事情已经结束。这使一些人扫兴，却也是方靖的“成功”之处。

后来方靖以此事例告诫下属们：“一定要与地方上搞好关系！”因此，各地驻军太平无事。当四川的“国大代表”去南京开会时，无不称颂七十九军“纪律严明”，方靖为人“清廉正直”。于是蒋介石和陈诚都很高兴，夸奖方靖“能干”，“会办事”。这也是七十九军能在四川屯驻四年之久的原因。

当然，闵、黄二人也不是白帮忙，他们在外面宣称：“方司令官是我们的好朋友！”于是许多人都登门送礼求其疏通，很发了一些横财。再者，从此他们贩运大烟也可以通行无阻了。

如此
“禁烟”

大烟，即鸦片烟，是祸国害民的毒物，已为世界各国公认，几乎所有政府（无论其性质如何）都绝对禁止种植、贩卖和吸食。然而，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鸦片烟的种植、贩卖、吸食都是半公开的，尤以四川为最普遍。尽管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陪都”设在重庆，蒋介石本人在歌乐山亲自执政，却始终没有对这祸国害民的毒物严令禁止或采取任何措施加以清除，基本上是听之任之。一九四七年秋，方靖去南京中央训练团受训，见到蒋介石，曾报告过关于四川军阀、恶霸种植、贩运鸦片烟猖獗的情况，蒋介石竟不犹豫地回答：“不要去管他们！”方靖知道，这是蒋介石鞭长莫及，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不得不向地方军阀和恶霸们妥协，求得这些人支持其政权。但是，他也知道，作为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如果他的部队参与其事，在舆论的压力下，蒋会丢卒保

车，严厉加以制裁，所以他对其下属管束甚严。

七十九军进驻四川以后，西康行营主任贺国光要求七十九军派一团人进驻西昌作他的卫队。因为西康在军阀刘文辉把持下，没有嫡系部队保驾，他这位主任便无法行使职权。方靖命九十八师二九二团进驻西昌。大约一年后，方靖又指令九十八师以二九三团去西昌换防。方靖告诫向敏思：“西昌盛产鸦片，风气又不良，部队在那种地方屯驻过久，难免要出问题。所以我命你派二九三团去换防，以后隔段时间就换防一次。二九二团由西昌回乐山，你要亲自带人去检查他们的行李，以防带回鸦片烟！”向敏思不敢怠慢，在乐山河边架了机枪，扬言：“查出携带鸦片者，立斩勿赦！”据说二九二团将士闻知，许多人在渡河时将携带的鸦片丢弃在河中。当时乐山县许多老百姓都闻讯到河边观看，对此举甚是称赞。

政学系的张群任四川省主席后，沽名钓誉，通过西南行辕，命令七十九军进边区铲除鸦片烟苗。

无论张群的目的何在，此举是于国于民有利的，所以谁也不能抗拒反对。但是方靖却为难了，因为他明知道这些烟苗都是有势力的军阀们种植的。这些人如杨森、邓锡侯等，不仅蒋介石承认为“国府”要员，而且都掌握有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倘若与这些人闹起对立来，自己还能在四川立足吗？

但是，他又如何能拒不听命呢？经过反复推敲，他召见九十八师师长向敏思，密谕：“你不妨把声势搞得大一些，去了见机行事。倘若能对话，就告诉对方：今后不要再种鸦片了，这一回呢，就让我们象征性的割除几棵烟苗，拿回来交差了事。”

向敏思知道方靖的苦衷，答应照计而行。

岂知九十八师兵马未动，邓锡侯却派秘书来向方靖下说词：“将军切不可听信文人腐儒的迂见。今日党国要务乃是‘防共剿共’，正要团结一致，对付共同之敌，如因此事而自己内部动干戈，蒋先生未必不谴责将军过激。请将军三思。”

方靖承认对方的话是有些道理的，但是，“动干戈”一说，未免过于强硬，刺伤了嫡系将领的自尊心。方靖勃然站起：“请回复邓主席（邓锡侯任过四川省主席），方某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别无所知。对我们精锐的嫡系部队来说，攻坚交锋，乃是家常便饭。敝军将士养息日久，正欲啖肉饮血，以解战饥！”

邓锡侯的秘书灰溜溜地刚走，闵锡如却兴冲冲而来：“海公钧座！‘前途’（指种植鸦片者）有信息传来，只要海公高抬贵手，当不难名利两收。”又举例说，前者某某军长也曾打算派兵前往，“前途”亦是托他从中斡旋，事后经他手给某某军长家乡汇去两笔巨款。闵锡如还说：“海公若不信，兄弟这里尚有当时汇票收据为证！”

方靖面对如此软硬兼施的阻梗，不禁苦笑起来：“闵先生，我若是个干大事惜命、见小利忘身的人，早先伸手向你要钱了。”他此时也不忘标榜“土木系”：“我们陈长官的部下都是不贪财不怕死的将领，哪里能要他的贿赂呢？请寄语‘前途’：今日之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倘若奉命不行，被张主席告上去，我的责任就重大了。部队到后，沿路目击之处的烟苗是要铲一部分的，因为总要让我们交待得过去吧！”

方靖总算不卑不亢地把话挑明了，他希望闵锡如能把他的“苦衷”传递给“前途”各方面，彼此留个面子。

四川产烟地区大多在与云南、贵州、西康交界的边区，即雷波、平山、马边、峨边等县一带。向敏思亲率二九三团前往，按照方靖密谕，本无真要动手的打算，不料对方也想示威，竟先开枪阻止部队前进。二九三团被迫还击。尽管对方人数占绝对优势，但与正规军交手，仍旧不堪一击。打了一天，扔下大片尸体，退到西康，投刘文辉去了。

二九三团也不追击，仍旧遵照方靖密谕，象征性地铲除道旁一部分烟苗，便迅速撤回。

张群对七十九军铲除烟苗不力甚为不满，曾向行辕主任朱绍良告状。朱绍良何尝不知方靖的“苦衷”，所以哼哼哈哈，不置可否。

事隔不久，泸县警备司令部在江边查获一辆小轿车夹带毒品。当时车上坐着一个挂着将级军衔的军官，并带有两名卫兵。当检查出毒品时，那位将军和随即便弃车逃之夭夭。

方靖命将查获毒品上报四川省政府。这本是一件好事，却不料四川省政府传出话来，说七十九军交上去的是个“零头”，整数均贪污私分了！并且要那辆小轿车。

这究竟是为罪犯张目，抑是对清铲烟苗不力的报复？不得而知；方靖的勃然大怒却是可以想见的。他告诉参谋长：“他妈的，说我贪污就贪污。你回复省府：小轿车在检查时拆散了，已作报废处理。再传令各部队：以后对贩毒走私不再干预！”那辆小轿车是不是拆散了呢？没有，后来成了方靖私有之物。

事实上大量贩毒也无法干预。暂二师就曾拦截一些以军用卡车贩毒者。对方在卡车上装有轻、重机枪，拒绝接受检查，于是两军相峙，几乎开火。方靖闻报，即命放行，才算没有引起大的纠纷。由于方靖持“明智”态度，所以各派军阀都称他是“黄埔中的俊杰”。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四川民间藏枪之多，大概在全国是手屈一指。盗匪也多如牛毛。这原属地方治安问题，但兼有警备大权的七十九军，都从未考虑过如何防盗除匪，更谈不到采取何种措施了。他们只求表面的平静，无政治性的暴乱，就心满意足了。从行轅乃至国民政府国防部对七十九军再三表示满意来看，其奉行的政策，是得到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的默许的。但是，地方武装力量危及行政官员行使职权，或者怀疑他们勾结共产党，那就必须认真清剿了。

一九四七年春、夏，七十九军两次奉命清剿地方武装力量。

清剿地方武装

第一次清剿是雷波地区的胡国光。

胡国光绰号“大辣椒”，两个弟弟也有“小辣椒”、“七星辣椒”之称，说明一个比一个毒辣。

由西南行轅转给七十九军的省府材料得知，胡国光势力浩大，妨碍省府派去的县长行使职权。据说，他拥有上千人的武装，还有一个兵工厂，能造步枪和子弹。

方靖分析情况，这胡国光也不过一方恶霸而已。他指令九十八师派兵前往，并密令：“去了力争谈判，告诫对方以后不得妨碍县长行使职权，所有枪支武器，去县政府登记备案。我们

不求过多干预。”这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

但是胡国光并不体会部队来意。当九十八师二九三团开到，派一排长前去喊话时，碉堡里竟开枪将排长击毙。二九三团当即用无线电向方靖报告，方靖又气又恨：“不识抬举——打！”于是二九三团发起猛攻。

尽管胡国光部队的火力甚强，仍旧经不起久经战阵的正规部队一击，未坚持几小时，胡氏兄弟便带着残部逃往西康。

七十九军第二次奉命清剿地方武装，是靠近云南边境宣威地区的尹禄才。据行辕材料，尹禄才部已有了连、排编制，并“可能有共产党混入活动”，所以方靖认为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即派驻泸县的一九〇师五八〇团团团长王作儒率部前往。方靖也有交代：“务必彻底清剿，克期完成任务！”

王作儒骁勇善战，率部到达后，即投入战斗。这支武装与胡国光之流不同，接火后与王作儒部展开阵地战，还真能打一气。打了一天，尹部在深夜撤退。王作儒也追击了一阵，见其退入云南境内，只好交云南保安部队继续追剿，自己率部返回泸县。

这次清剿战况，经过层层参谋人员上报“战绩”，吹得天花乱坠。五八〇团本是可以得西南行辕嘉奖的，却不料节外生枝：在西南赫赫有名的龙三公子（云南军阀头子、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的三儿子）告了七十九军一状，说五八〇团在清剿尹禄才部时，营长龚传辉烧毁了他的小老婆娘家的房子。俗话说：“一纸入公门，无赖不成词。”龙三公子还附带加了一句赖词：“又抢去鸦片烟数百两。”

龙三公子在西南飞扬跋扈，与财阀孔祥熙家的孔二小姐，是当时国人童叟皆知的一对“横人”，国民党朝野侧目。这位三公子决不是戏剧舞台上的三公子王金龙那样，仅仅嫖娼宿妓，挥金如土。龙三公子在昆明收蓄大量亡命之徒，组织浩大恶势力，公然与“国军”太上皇“盟军”对抗。后来蒋介石为抑制龙家父子，派杜聿明进驻，杜将战车耀武街头，才使其气焰稍有下降。

象这样的人物告状，西南行辕不能置之不理。于是命方靖逮捕龚传辉，派人解押至重庆处置。

方靖认为：作战时由于战术需要，拆毁些妨碍视野、容易被敌方当作进攻掩体的建筑物，是极正常的事。至于说抢劫鸦片烟一事，除尚需调查证实外，还应考虑鸦片烟是违禁品，拥有违禁品者居然成了原告，并且胜诉，这大概是古今奇闻！

方靖还考虑到龚传辉是一九四师师长龚传文的弟弟。龚传文是他的老部下，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老部下的弟弟蒙受不白之冤！但是，原告是权贵，要抗拒会有许多麻烦。他考虑再三，“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传见军直属警卫营第一连连长吴有德，吩咐：“你派两个人，把营长龚传辉押解到重庆交行辕军法处。”

按理说押解本部一个少校军官，应派一个军衔较高、起码也是同军衔的军官为监护才便于看管。现在方靖竟把这个差事交给一个年轻的上尉连长，而且在吩咐时轻描淡写，没精打彩的，吴有德也就不把这任务当成多么重大的事，随随便便派了一个排长，带一名士兵押龚传辉上路。更有趣的是，这位被押

的官员居然戎装整齐，肩上还佩着少校军衔，于是形成这样的情况：龚传辉毫无拘束，押解他的两个人，倒象是他的护卫，一路上对他伺候得周到已极。

到了泸县，龚传辉声称要去访友，吩咐那两个“好好看守行李”，便扬长而去，不再返回。

方靖闻报，将吴有德连长调为副员，算是对他“失职”的处理吧。然后一面下通缉令，一面上报西南行辕。

这本是件不言而喻之事，西南行辕自然心照不宣。大约也对龙三公子方面作了一番敷衍，以后再没有深究此事。